
SCIENCE, POLITICS AND RELIGION:
DEBATES ABOUT VERBIEST'S INVOLVEMENT
AT THE ASTRONOMICAL BUREAU

科学、政治与宗教：
关于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的争论

THIERRY MEYNARD 梅谦立

摘要

在我们庆祝南怀仁诞辰 400 周年之际，同时也缅怀他本人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最悲惨的事件——由杨光先挑起的历狱，导致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基督宗教并逮捕几乎所有传教士，而这种回忆是非常有意义的。最近基于满文、汉文和西文著作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康熙是如何抓住历狱的机会除掉摄政王并实行个人统治的。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将探讨流亡广州的传教士如何评价南怀仁在清钦天监的参与。他们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一点：忽视科学、政治和宗教之间的界限就会导致这三个之间的关系变得很脆弱。

导言

南怀仁是一位科学工作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物理世界。在政治层面上，他是康熙皇帝的贴身外臣。他还是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推广基督信仰。他试图尽力协调科学、政治和宗教这三个层面。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欧洲耶稣会士奉行的政策，他们将科学工作、与欧洲宫廷的接触以及基督教生活的复兴结合在一起。这种科学、政治和宗教的结合在欧洲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耶稣会、政治势力和学术界不断调整的结果。在中国，随着1664年开始、1671年结束的历狱（Calendar Case 亦译“历狱教案”），科学、政治和宗教之间微妙的和谐似乎遭到了破坏。这导致汤若望（Adam Schall）、南怀仁（Verbiest）和在钦天监工作的中国基督徒被捕，25名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1668年和1669年，南怀仁击败了他的对手杨光先，重新建立了西欧人的信用，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康熙利用历狱教案来镇压四位摄政王，这样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¹科学、政治和宗教再一次实现了和谐。在历狱教案期间，南怀仁与广州的耶稣会士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七封信至今仍被保存下来，其中一封是1668年4月18日写给法国耶稣会士聂仲迁神父（Adrien Grelon）的，两封是1670年1月23日和1670年8月20日写给佛兰德耶稣会士柏应理神父（Philippe Couplet）的、两份分别于1670年1月23日和1670年8月20日写给另一位佛兰德耶稣会士鲁日满神父（François de Rougemont），一份于1670年8月20日写给法国耶稣会士刘迪我神父（Jacques Le Faure），一份于1671年1月1

¹ 康熙六岁即位时，有四位大臣辅佐。其中一位是鳌拜，他独揽大权，与其他人分庭抗礼。1665年，汤若望神父被诛，杨光先取而代之。1668年底，杨光先被证明不懂天文。1669年，康熙解除了杨光先的职务，由南怀仁取而代之。两个月后，他下令逮捕鳌拜，并亲政。

日写给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神父（António de Gouvea）（见Golvers, 2017年，第166-209页）。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探讨1666-1669年传教士流亡广东之初的争论。传教士们在经历了被捕并被驱逐到广东的震惊之后，试图分析迫害的原因，并将问题归结为他们所认为的科学、政治和宗教的不健全结合。在这场威胁到80年前成立的年轻的中国传教团生存的重大危机中，他们对1644年以来基督徒与满清政府合作（the Christian alignment with the Manchus）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还质疑一些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的合法性。

然而，1669年北京局势的发展对耶稣会士有利，南怀仁恢复了他在钦天监的地位，广州的许多传教士也放弃了之前对教士与天文学和满清政治结合的担忧。他们热烈欢迎南怀仁的平反，希望这能让他们迅速返回自己原来服务的教会团体。然而，如果认为他们又回到了历狱教案之前的状态，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讨论的那样，虽然大多数传教士最终接受了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可以在钦天监任职，这表明他们愿意在科学、政治和宗教之间找到新的结合点，但也有人反对南怀仁在钦天监担任正式职务，强调必须尊重科学、政治和宗教之间的界限。

揭穿科学、政治和宗教的问题组合

历狱教案给汤若望和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震撼。当然，从1648年开始，安文思神父（Gabriel de Magalhães）和利类思神父（Lodovico Buglio）就已经通过致罗马的信函表达了他们对汤若望参与满清宫廷事务的担忧，主要有三点：第一，汤若望的工作必然会沾染上预兆迷信的做法；第二，汤若望在宫廷中担任的官职违背了耶稣

会不接受此类职务的规定；第三，汤若望担任此类职务会使他失去谦逊的基督徒美德。然而，耶稣会总会长乔瓦尼-保罗-奥利瓦（Giovanni Paolo Oliva）和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都摒弃了这些顾虑，肯定了耶稣会士在钦天监的工作（见 Dunne, 1962年）。

在流亡广州期间，传教士们一直在寻找迫害的根源。谁是罪魁祸首？杨光先是最直接的答案，但传教士们认为有必要将历狱教案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一些人看来，1664年发起的迫害应该被解释为清朝与基督教之间问题重重的关系的结果，这种关系早在二十年前，即1644年由满清亲王多尔袞和汤若望（Schall）建立了。流亡广州期间，三位耶稣会士撰写了大量关于历狱教案的互补性报告，他们将历案重新纳入冗长的历史叙事中：聂仲迁神父（Adrien Grelon）用法文写《鞞鞞统治下的中国史》（1671年）、毕嘉神父（Giandomenico Gabiani）用拉丁文写《鞞鞞人镇压中国教会发展》（1673年）以及鲁日满神父（François de Rougemont）的拉丁文著作《鞞鞞中国新史》（1673年）。三人都意识到，在讨论新王朝统治下基督宗教的未来时，他们都继续卫匡国神父以《鞞鞞战争史》（1654年）开始的历史研究。

决定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明代皇帝的懈怠，作为改革成果的《崇祯历》从未正式颁布，汤若望也从未在明朝的钦天监获得正式职位。直到1644年，汤若望才在朝廷中获得正式职位，从1644年起，教会的地位与汤若望在钦天监的职位紧密相连。虽然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允许基督信仰的传播，但汤若望神父的职位为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从事传教工作提供了声望和保护。

到1664年，传教士们面临着基督教传教被摧毁的危险，他们开始提出一些敏感问题。二十多年前，清王朝以残暴的手段征服了中国，而其他耶稣会士如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和卜弥格（Micha Boym）却支持南明，汤若望与清王朝如此密切地合作是否正确？除了政治效忠问题外，还有文化问题，因为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文化，而他们对满族文化相当陌生。最后，汤若望接受钦天监的官方职位意味着纵容占卜的迷信做法，这样做正确吗？最后一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天文工作当华人皈依的工具的合法性（the legitimacy of astronomical work for the conversion of China）。

在神学层面上，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允许当前的迫害是否只是为了准备基督宗教战胜其在中国的敌人。一些传教士

1668年和1669年，南怀仁击败了他的对手杨光先，重新建立了西欧人的信用，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完全是因为康熙利用历狱教案来镇压四位摄政王，这样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事实上，满清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当时汤若望向多尔袞提供服务，为新王朝制定历法。尽管效忠对象从明朝转向了清朝，但汤若望的决定与耶稣会士在明朝最后十五年参与中国历法改革的

认为撒旦正在通过杨光先禁止基督教，但上帝已经通过地震、洪水和天象向异教徒显示了祂的旨意。最明显的表现是1665年4月在北京发生的地震，满人都都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并决定将汤若望、南怀仁和另外两名耶

稣会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1668年，在广州的传教士们热衷于阅读当地的报纸，了解当年夏天在华北发生的自然灾害，使他们相信上帝正在降下征兆，为信仰的最终胜利做准备。例如，鲁日满神父（Rougemont）提到了一系列预兆或征兆，包括地震后出现在一块石头，而石头上写了20个神秘汉字（Rougemont, 1673年，第320-323页）。传教士们将这一系列自然灾害与历狱教案中的戏剧性事件联系起来，并将其解读为神与恶之间的宇宙斗争的征兆，这场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历史。

徒在弥撒中戴帽子，以表示对圣体的尊重，因为戴帽子是中国文化中表示尊重的通常方式，但根据李方西的说法，1644年汤若望犯了一个严重的、认同新政府的错误：他过于草率地认同满清已经废除了戴帽子的习俗，并要求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信众在弥撒中不再戴帽子（Ferrariis, 1668年）。

1667年12月和1668年1月，耶稣会士在广州会议上讨论中国人的帽子问题时，汤若望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如上所述，耶稣会士们将汤若望描绘成信仰的殉道者，但他们批评他与满清关系密切。换句话说，李方西

历狱案危机显示了与科学和政治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在这种关系中，基督教的命运将不取决于他们在钦天监的工作，而是取决于文人中的科学传教与中国神职人员领导的大众传教之间的新平衡。

聂仲迁（Grelon）、毕嘉（Gabiani）和鲁日满（Rougemont）的历史记载都展示了相同的神学解释：正如许多预兆所证明的那样，受迫害的中国教会即将通过神的干预而得到拯救。他们的报告强调了在中国建立教会的必要性，这既不是基于天文科学，也不是公开依赖满清，而是基于信仰的最高见证。自16世纪90年代起，日本教会就有了自己的殉道者，中国传教士认为，中国教会也需要通过殉道者的鲜血来建立自己的教会。对于广州的耶稣会士来说，1666年8月15日去世的汤若望与其说是通过科学传教的典范，不如说是殉道的典范。

当南怀仁试图说服北京的满族人时，在广州的传教士中却重新出现了反满情绪。意大利耶稣会士李方西神父（Giovanni Francesco de Ferrariis）在其著作中讨论了在天主教弥撒中使用中国帽子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正如他在1688年的报告中解释的那样，1644年之前的耶稣会士允许中国信

认为迫害的部分责任应由汤若望承担，因为他将所有传教士暴露在杨光先的政治攻击之下。除了汤若望的战术失误，李方西还断言满清与基督教在文化上根本不相容。他将鞑靼人描述为野蛮、粗俗、傲慢无礼的民族，这似乎又要求完全否定多尔袞和汤若望在1644年建立的满清-基督宗教联盟。李方西认为，汤若望与满清宫廷如此密切地合作是不明智的，因为满清宫廷缺乏明朝的成熟，无法欣赏基督信仰。

关于恢复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的辩论

李方西（Ferrariis）于1668年10月10日完成了关于中国帽子的报告，但在1669年年中，他与其他在广州的传教士一起得知南怀仁战胜杨光先的消息后，他的反满情绪可能有所缓和。事实上，从1668年12月到1669年3月，南怀仁一直在展示西方天文学的优越性。广州的耶稣会士根据从南怀仁、

安文思 (Magalhaes) 和利类思 (Buglio) 收到的信件, 在自己的报告中热情地向欧洲转达了这一喜讯。聂仲迁 (Grelon) 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章是“欧洲天文学在中国重新建立的荣誉”, 叙述了南怀仁在太阳计算上战胜杨光先的故事, 另一章是“皇帝对神父们的极度恩宠和仁慈的表现”, 康熙于1669年4月4日接见了北京的传教士 (Grelon, 1672年)。毕嘉 (Gabiani) 还讲述了南怀仁如何在圣诞节期间通过太阳计算战胜他的敌人 (Gabiani, 1669年)。基督信仰有希望, 可以摆脱“煽动性教义”的指控, 得到平反, 并被允许为正常的信仰。

对许多传教士来说, 默许他们在当地的教会团体中恢复传教工作而不参与钦天监的工作就足够了。但当南怀仁获得钦天监的职位时, 传教士们却产生了分歧,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班牙多道明会会士闵明我 (Domingo Navarrete) 那里了解到。据他说, 当南怀仁向皇帝表示不希望接受这个职位时, 南怀仁会争辩说, 汤若望也不希望担任这个职位, 但在顺治强迫他接受后, 汤若望总是感到“悲伤和不满” (*triste y disgustado*; Navarrete, 1676, p.350)。汤若望不情愿地接受钦天监的正式任命, 这与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 (Antonio Caballero) 所写的内容相吻合, 他称汤若望知道历法附带的迷信, 曾多次试图辞去职务, 但顺治不允许 (Caballero, 1915年)。然而, 根据闵明我 (Navarrete) 的说法, 当何大化神父 (Gouvea) 和刘迪我神父 (Le Faure) 听说南怀仁和康熙之间最近的讨论时, 他们爆发了: “南怀仁在撒谎, 他们应该为此砍下他的头; 难道他不知道, 对皇帝撒谎的人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 我们不知道闵明我是否相信何大化和刘迪我谴责汤若望不道德妥协的激烈言辞, 尤其是因为刘迪我 (Le Faure) 在历狱案之前曾撰文为汤若望在监天钦的工作辩护 (Le Faure, 1664年)。

即使如闵明我 (Navarrete) 所称, 何大化 (Gouvea) 和刘迪我 (Le Faure) 在某个时期反对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 但至少在 1668 年底, 他们接受了这一举动, 认为这是传教士返回教区的唯一选择, 正如他们的信件所显示的那样。1668年10月26日, 刘迪我致函罗马耶稣会总会长, 讨论天文学 (和数学) 在中国传教士中的地位, 表示有必要派遣更多耶稣会数学家到宫廷支持南怀仁的工作。刘迪我 (Le Faure) 提到, 现任副主教成际理 (Feliciano Pacheco) 和他的顾问们也支持这一计划, 但耶稣会驻澳门探望者路易·达伽马 (Luís Da Gama) 却禁止南怀仁接受这一职位, 即使皇帝下令也不行。与此相反, 刘迪我 (Le Faure) 试图推翻其上司达伽马的决定, 他鼓励总主教派遣更多像南怀仁这样的人前往北京 (《刘迪我传》, 1668年, 页 224v-225r)。

一年半后, 也就是1669年, 时任中国副都督府副都督的何大化 (Gouvea) 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 支持提名南怀仁为北京耶稣会的会长, 尽管达伽马反对, 并抵制向宫廷派遣优秀的天文学家。我们可以看到, 广州的耶稣会士最终接受了这一事实, 即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正式参与钦天监的工作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required their official involvement with the Astronomical Bureau), 但澳门的耶稣会视察员和道明会的闵明我神父 (Navarrete) 仍然强烈反对。

结论: 科学与政治的新关系?

1644年由多尔衮和汤若望建立的满清-基督宗教联盟在1669年由康熙和南怀仁重新确立。西方天文学的恢复为天主教会开启了长达55年的帝国保护期, 直到1725年雍正禁止基督教。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一切又回到了1664年之前的状态, 但事实上, 七年的禁

令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宗教与清廷的关系，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支持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在钦天监发挥作用的耶稣会士并不天真。在1671年3月6日的一封信中，鲁日满神父（Rougemont）写道，耶稣会传教士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们在钦天监的工作，而钦天监的工作是非常不稳定的，对汤若望的迫害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最近发生了政治变革，但只要在华的教会还依赖于外国传教士，它始终会非常脆弱。对鲁日满神父来说，基督信仰在中国长期扎根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中国的神职人员（Meynard, 2020, p. 151）。历狱案危机显示了与科学和政治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在这种关系中，基督宗教的命运将不取决于他们在钦天监的工作，而是取决于文人中的科学传教与中国神职人员领导的大众传教之间的新平衡。然而，由于1671年后又有可能引进新的外国教士，传教士们认为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靠自己的力量继续传教，并没有真正推动培训本地神职人员的工作。后来，雍正禁止基督教活动，教会严重缺乏本地神职人员，难以为继。



梅谦立，中山大学

REFERENCES 参考资料

- Caballero de Santa Maria, A. (1915). *Relación de la persecución en China por Fr. Antonio de Santa Maria*. Madrid: Imprenta de Gabriel López Del Horno.
- Dunne, G. (1962).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Ferrariis, F. (1668). Apud Sinas in signum reverentiae tegendum esse caput (Covering the head as sign of respect in China), ARSI, ms. *Jap. Sin.* 158, “Controversiae variae: 1668–1698”; ff. 10r–17v; translation Thierry Meynard, “To wear or not to wear a hat during Mass? The Canton Conference and Giovanni Francesco de Ferrariis’s Report of 1668,” in *AHSI* 179 (2021-I): 5-61.
- Gabiani, G. (1669). Letter in Italian to Jesuit Superior General, 6 February 1669, ARSI, ms. *Jap. Sin.* 162: ff. 275r-276v.
- Gabiani, G. (1673). *Incrementa Sinicae ecclesiae, a Tartaris oppugnatae*. Wien : Leopold Voigt.
- Golvers, N. (2017). *Letters of a Peking Jesuit*,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 Gouvea, A de (1670). Letter in Portuguese to Jesuit Superior General, 6 March 1670; ARSI, ms. *Jap. Sin.* 162: ff. 297r-298v.
- Grelon, A. (1671).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Paris : Jean Henault.
- Grelon, A. (1672). *Suite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 imprimée en 1671*. Paris: Jean Henault.
- Le Faure, J. (1664). Tractatus apologeticus de omnibus quae spectant ad Tribunal Mathematicae apud Sinas in quo probatur quomodo P. Addam Schall et omnes eiusdem Tribunalis Mandarinii licite officio suo fungant; Archives jésuites de Vanves, France : ms. GBrotier 94 : 31-44.
- Le Faure, J. (1668). Letter to Jesuit Superior General, 26 October 1668; 1a via: ARSI, ms. *Jap. Sin.* 162: ff. 223r-226v.
- Martini, M. (1654).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Coloniae : Jodocum Kalcovium.
- Meynard, T. (2020). “For the record: The Canton exile of the missionaries (1666-1671) by the Polish Jesuit Szpot Dunin.” *Annales Missiologici Posnanienses* 25, pp. 147-185.
- Navarrete, D. (1676). *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Juan Garcia Infançon.
- Rougemont, F. (1673). *Historia Tartaro-sinova*. Leuven : Martinus Hullegaerde.